

性别与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李晓红

摘要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作品多以爱情、家庭和婚姻为主题,其特征表现为重反抗轻批判、重主观轻客观、重纵向轻横向。当代女作家的作品虽有重大改观,但仍然囿于主观的个体,发出一己的声音,而始终没有上升为对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关怀。这是影响中国女作家不能成为文学大家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现当代女作家 作品 性别

文学创作由多种成分构成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作家的身世、作家的才识以及社会环境、时代风云无一不对文学创作的走向起着这样或那样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文学的世界毕竟是由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共同创造的,因此,如果我们忽略性别在作家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一些文学现象便难以得到很好的解释。本文试图从性别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入手,探讨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大致特征及发展走向。

一

如果我们对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作品作一个大概的统计,在创作题材上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爱情、家庭和婚姻为主题的作品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多数,并最有成绩,也最具影响力。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女性囿于家庭之中,家庭是她们最重要的生活舞台,甚至就是整个世界。她们从家庭中所承受的负荷比男性沉重,对家庭束缚的反抗比男性强烈,对家庭幸福的向往比男性热切。因为家庭的幸福常常是她们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最终的幸福,家庭的不幸往往像一票否决权一样否定着她们的人生。除此之外,她们找不到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情感、另外一种寄托能够与家庭相平衡。自五四运动开始,她们才有权力选择自己婚姻的对象,一旦拥有这种权力之后,她们对爱情的对象、婚姻的品质要求自然就十分之高。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对美好婚姻的渴望、对互敬互爱的家庭关系的向往是中国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这类主题的作品当然在当时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几乎每一位现代女性作家都有过这一类型作品的创作。从庐隐的《海滨故人》,冯沅君的《卷菀》,萧红的《小城三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性为了追求完美、纯真的爱情的心路历程。

当然,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不是没有这类题材,但男性作家同女性作家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女性作家在展现爱情、婚姻生活时不太像男性作家那样把它置身于更大的社会政治经济舞台。从《莎菲女士日记》中只能隐隐约约感受到五四时期的时代背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时甚至看不到具体的时代氛围。而男性作家往往把爱情与婚姻置于社会人生这个更大的背

景,在中国现代男性作家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中,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家》和《寒夜》,作家笔下不仅展现时代的沉重投影,而且直接描绘当时的社会生活。他们多是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描写这类题材。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爱情、婚姻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并不像女性那样在生活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如何在社会中谋取一定的地位,才是他们努力的目标。因此,对男性来说,爱情和事业、家庭和社会两者既相影响,也相制衡,甚至可以相取舍。但是,中国女性只能在家庭中兜圈子,她要么就在这一个家庭中完全沉迷或沉沦,要么选择另外一个家庭进行再一次肯定或否定。

所以,同样是描写婚姻、爱情、家庭的作品,一般来说,女性作家在情绪的张扬上来得比男性强烈,在问题思考上却明显比男性不足;在心理的刻划上来得比男性细腻,在社会时空的展现上却不如男性深广;女性作家反封建的意识比男性更迫切,但对封建的批判上却不如男性有深度和力度。

由于中国现代女性囿于家庭狭窄的生活圈子,所以女性作家的素材积累主要是来自自己亲身的生活体验,因此自传体和准自传体的作品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比例,这种现象导致了现代女性作家创作中的几个特征:1. 个性化色彩特别重,主观意识强于客观表现;2. 女主角在作品中的位置占有绝对的、甚至是排他的优势;3. 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命运是女性作家创作中最重要的表现线索,因而其作品经常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纵向状态;4. 缺乏横切面的分析式的作品。

二

上述现象在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创作中得到了局部、甚至是很重要的改观,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作家的创作出现了十分复杂的现象。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女性开始走出家庭狭小的生活圈子;生活视野的扩大,使当代女性作家的文学视角也相应扩大。因此,女性作家的创作和男性作家一样,题材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风格也多样化起来。老一辈的作家张洁,既有《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类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又有《沉重的翅膀》这样反映改革的作品。新生代的徐坤除了有《白话》、《梵歌》、《吃语》等她所熟悉的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外,另有《小青是一条鱼》这样表现“新新人类”的作品,在《沈阳啊,沈阳》里,徐坤则把目光投向更为敏感和重大的社会生活题材:下岗的困惑,生活的波动,时代的变迁。徐坤把人文关怀落实到实处,她与被誉为“新现实主义三架大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当代文坛把一些女作家誉为“女某某”、“女某某”,这里的“某某”是男性作家的代名词,这似乎令人感到性别差异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已经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只要透过这一系列的现象,深入女性作家创作的实质,就会发现性别仍然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比如,毕淑敏的《预约死亡》、《生生不已》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恋爱、婚姻、家庭的主题,在《预约死亡》里,连一般男性作家都不敢问津的死亡题材却被这位女性作家严肃而冷峻地面对。毕淑敏的作品中流露出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方式对人的关怀,哪怕是谈虎色变的临终关怀。而《生生不已》则将一位母亲在失去女儿后渴望再次做母亲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表面上它只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问题,而实际上这是所有独生子女的母亲都要面临的问题。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毕淑敏是一位女性和一位母亲不无关系。叶广芩的作品也表现了一位女性作家对人生的种种苦难和世界的种种不平的关怀。战争

题材、苦难题材、人伦题材和动物题材，女性作家的视野被广泛地延伸了。我们甚至能够在当今文坛一片怀古、调侃、玩世和零度情感的“流行歌曲”中突然听到了久违的愤怒的声音。女性的情感表达习惯于喜、思、愁、嗔四种状态，女性的“怒”过去被特定化为顶多是“嗔”这种状态，拍案而起似乎和女性毫无关联，但从叶广芩的作品中我们清楚地听到了女性的愤怒的声音。这种愤怒同样是一种关怀，尽管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母性的关怀。

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的另一重要现象是，在一贯是男性作家占据主要地位的文坛出现了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徐坤的《白话》这些作品。它们都分别是某些文学流派或某些文学现象的代表之作，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较有影响的作品。《你别无选择》用一群音乐学院学生们的焦躁不安、寻寻觅觅传达出“黑色幽默”的效果。王蒙曾评价说这是中国“最现代”的一部小说。《烦恼人生》把人生的种种浓缩到印家厚一天的生活当中。虽只是一个男人的普通的一天，但因为它的典型意义使这篇小说成为“新写实”的代表之作。在《风景》里方方塑造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七哥形象：他在生活最底层的顿悟，以及顿悟后追求结果的荒谬。一部《风景》使方方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

为什么这些女性作家能够在有男性作家参与的文学思潮中一领风骚？为什么这些女性作家能够打破所谓男性语言霸权从而分庭抗礼？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当代女性作家一反现代女性作家的主流风格，她们不再是对人物的命运特别关注，而是对人物的生存状态本身十分关切；她们不再是纵向地叙述人物在事件中的结局，而是在横向地分析和描写人物于所处环境的尴尬；她们不再是主观地、自传体式地直接表露作家自身的情感，而是或隐匿其间、或超然物外地对生活 and 世界进行理性的玩味、智慧的调侃。这种情况使得人们似乎极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作家的性别意识已经淡化，甚至称之为无性别写作。但是只要深究其间，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恰恰因为女性的性别特征才使得这些作家能够写出这样的题材，而且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描写这样的题材。在一次记者的访谈中，当徐坤被问到她本身处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群体中，为什么还能够身在“庐山”写出“庐山”真面目时，徐坤回答说：是女性的性别特征使她产生了一种“隔”，即使她进入了所谓“精英”的圈子，但是在这一片男性化语言霸权的氛围中，她仍然感受到她身处其间又不在其间的“隔”。这样才使得她在面对她所要分析、描写、表现的对象时，有超然物外的冷静和达观宽容的幽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刘索拉、方方和池莉等，也正是因为这种“隔”，使她们比男性作家更能感受和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尴尬、矛盾和荒诞。

三

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后开始苏醒的。客观上，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对女性的自觉起着启蒙、催化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们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的观念——在家庭中的平等、在爱情关系中的平等。她们开始勇敢地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反抗包办婚姻，寻求自己的爱人。然而，现代的女性常常发现中国的男性在爱情上并不如他们所言、如她们所想象的那样勇敢、坚定、有责任感，当爱情与其他的人生目标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以牺牲爱情来保住自己。可以说，中国的女性被中国的男性召唤着而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之后，却往往无法找到可以“对话”、可以终身相依之人，她们甚至被

被社会看成“另类”，这使她们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庐隐在《海滨故人》、《何处是归程》、《胜利以后》等作品中以近乎自传的方式来表现了女性走出家庭后的迷惘与痛苦。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中的莎菲更是以颓废、自戕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绝望之情，她被一个自己十分瞧不起的男子爱恋着，自己朝思暮想的男子却又是那样一个卑鄙的小人。张爱玲似乎对男人看得较透，她笔下的男性多是些“绣在屏风上的鸟”，软弱、无能，而女性大多不对爱情抱有幻想，她们只想把自己嫁出去，把自己嫁得好一点，饭票握得长期一点，如此而已。而对爱情抱有幻想的人往往非死即伤，反而是白流苏这样以嫁人为目的的女子获得了“倾城之恋”。

到了当代，当张洁发出“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感慨没有多久，张辛欣就开始迷惘与叹息“我在哪儿失去了你”。更年轻的一代女作家们则不再讴歌爱情，张欣的《爱又如何》、《今生有约》等多写的是都市里伤感的情爱故事，池莉干脆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不谈爱情》，叶广芩的《黄连，厚朴》则以一位女性的情感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男性的失望与愤怒。于生存状态中批评男性的自私与软弱在女性作家作品中更是比比皆是。方方在《风景》中以荒诞的结局调侃了七哥一辈子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对七哥一生的反讽。在《桃花灿烂》中作者让栖患得患失而步步皆错，最后失去了心爱的星子。徐坤在多篇作品中对研究所里的高级研究员们进行讽刺性的描写。而当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却往往美丽而坚强，像谌容的《人到中年》里的知识分子陆文婷、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中的母亲辣辣，她们在生活中忍辱负重，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像王琦瑶这样的都市弱女子，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里她仍比身边的任何一个男性都坚强。在这一类的作品中，男人只是陪衬，只是为了赞美女性而存在，他们有时甚至显得那么的软弱和可笑。女性作家对笔下的男性往往流露出失望或批判的情绪。这或许是生活的真实，但女性的这种自我同情和“自恋”使她们往往不能看见或正视自身所存在的缺点和缺陷，如情绪化、非理性，使她们在两性关系中多采取对男性批判的态度，对悲剧的产生较少从自我的角度进行反思或忏悔。而杰出的作家的人格素质之一往往是具有反思或忏悔意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和《伤逝》，巴金先生的《寒夜》和《随想录》，无不对个人或社会悲剧的造成从自我进行反思。他们的反思或忏悔，使整整一个民族感动与感悟，更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感受到他们巨大的人格魅力。反观女性作家，她们往往把悲剧归咎于社会或男性的压迫，很少从自我来进行反思或忏悔，后果是致使女性作家的作品少见有巨大影响力之作，女性作家少见有伟大人格魅力之人。因此，当女性满世界在找压迫自己的原因时，不要忘记自己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当女性发出对社会批判的声音时，不要忽略对自我反思、批判的声音。

曾经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要想取得女性的真正解放，让女性作家获得更高的文学成就，必须对几千年来的男性话语进行颠覆，或者创造另一套女性话语。这种在语言上要求权力的再分配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或许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必须看到的是，女权主义者在在对几千年来的男权进行反动的同时，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以致对性别压迫的反抗开始卷起一场两性之间的战争，一些人忽略了妇女解放的真正目标是两性之间的平等、和谐与合作。人类的理想就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当然更包括两性之间的和谐。而目前有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对女性最隐秘、最本真的感觉进行更大胆的暴露和更细致的描写，在女性特有的“记忆”当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这种“私人化”的写作对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作家文学创作题材的开拓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把它们当作目前女性作家创作的不二法门则是令人担忧的。女性的解放不是向男性索要权力的过程，而是和男性一道既克服男性弱点也克

服女性缺陷,既追求女性自由也追求男性幸福的过程。性别意识的觉醒不是对自己性别的迷恋或对其他性别的排斥,而是确定在人类共同发展的道路上自己应享有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应该说,目前已有个别的女性作家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比如方方在《一唱三叹》和《桃花灿烂》中对家庭悲剧的产生就从过去一贯被男性赞美、令女性自傲的“牺牲”、“奉献”的母亲身上去寻找原因,当然这种思考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仍是不够的。在今天,女性作家的创作已经跨出一己的狭隘空间而走向广阔的世界时,女性作家的创作回到“自己”却不应封闭自己,向内开掘更要向外延伸。

四

由于20世纪的中国女性生活境遇的不断改善,女性作家的创作也取得了从未有过的成绩,女性作家灿若群星。她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已经从个人体验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只要对这一“繁荣”现象冷静地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流的大家中似乎很难见到女性作家的名字。相当多的论者认为这是长期以来男性语言霸权的结果,女性的声音往往发不出来,即使发出了也不被重视或被掩盖,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发生在中国,是世界性的共同的现象。的确,在整个语言环境中,女性作家始终没有占据到主流社会的主流声音,但这不能成为女性作家总体成就低于男性的全部理由,也不能成为难见女性文学大家的理由。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女性作家习惯于把自身囿于一个主观的个体,即使触及到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共同关切的重大主题时,仍然是仅仅发出一己的声音,而不是成为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代言人。所以她对现实事物的一己关怀始终没有上升到整个民族精神的终极关怀,她不是代表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对人生苦难的关怀,而是一个具体的“我”对一个具体的事件、具体的对象的关怀,哪怕是对整个民族的关怀,也不是作为民族的代言人或拯救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女人或母亲发出的关怀。所以她的作品也就难以作为民族和人类的最高精神财富保留下来。她能代表一个方面,她能代表一个领域,但是她却不能成为整个时代的代表和整个民族的象征。而真正的文学大家指的正是后者。

当20世纪的中国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已经跨出了相当大的步伐、走向多元化的方向时,我们应该珍惜这种进步的来之不易,在对个体关注的同时不忘对人类的关注,在关怀女性的同时包容对社会的关怀,只有这样,21世纪才可能有更多优秀的女性作家、甚至女性文学大家的出现。

作者 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 责任编辑 贺秀明